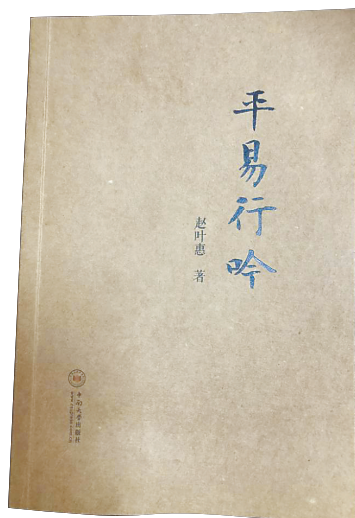


图里书外

择善明用 率性丰满

——读古体诗集《平易行吟》



彭伟平

近日拜读了中国作协会员赵叶惠先生的古体诗集《平易行吟》。这本集子收录了他156首古体诗。

《平易行吟》中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均有，以五言、七言居多。虽是古体，但思想是新的，语言是新的，内容丰富灵动，充满了现代生活气息。正如诗人刘克胤提出的“诗主性情，出乃心声，矫揉造作，自缚手脚，则失之弥远。”诗歌是一种深厚积淀下的即时情感表达；诗歌创作要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且不被其束缚。《平易行吟》既有历史的厚重感，更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古树上开出的新花。

《平易行吟》分为仰、景、风、和四章。“诗言志”“诗缘情”。赵叶惠先生运用古体诗这一艺术形式，汲取新诗的营养，凭借凝练、雅致、清新的诗语，向读者呈现出一个个丰满的艺术形象，一幅幅感人的画面，从而体现了其价值取向和家国情怀。如《瞻仰韶山毛泽东铜像》：“韶峰独秀万山翠，舜乐和鸣动八方。一卷相持乾坤手，九州共沐日月光。”壮阔的景象，豪迈的气魄，如神来之笔，表现了毛泽东这位伟大领袖的光辉业绩及其思想的绚丽光芒。

再如《瞻仰陈唐大将故居并谒夫妻合葬墓》：“百战归来息故地，携樽乘月说征途。疆场纵横惊壮胜，扬威异域每叹服。用兵莫测日酋怒，设伏难防倭鬼哭。挥师佐帅破敌胆，十六国签停战书。越南狼烟遮望眼，丛林笑指射高卢。应痛近代多国难，教识英雄战阵图。”典雅而自然的诗句营造了清丽脱俗意境，诠释了深刻的思想。《题东山书院》：“玉带绕莲台，净瓶倾泉瀑。楼阁历久远，光华耀耀林。草新松愈翠，院静鸟音纯。东台曾照影，钟鲤跳水频。一声问虎踞，万里颜色新。秀气钟英哲，凝神寻福音。”作者摄景入诗，借景抒情，令人陶醉其中，久久回味。

全书中这种特色的诗篇，都包含着作者对领袖、对先贤、对时代、对人民、对大自然的深情与感人的敬仰之情。

中国古典诗歌的诗意流淌在自然山水中。《平易行吟》中的“景”都是作者在人生旅途、大自然中，被高山流水荡涤心胸、被自然景观所陶醉而表达的“道法自然”的理念。如《山野行》：“雨后草色新，日暖鸟啼轻。闻道梨花开，相约山野行”。再如《初夏向晚登塔山遇雨》：“层峦如翠嶂，空谷起炊烟。雨急鸟停语，风微雾渐生。青山举白塔，妙笔指冥天。云天张巨帛，谁可写青丹。”置身大自然的心旷神怡与神奇自然的雄伟，清新扑面而来。在“景”这一章，这样的诗俯拾皆是。

而在“风”中，作者通过对世俗弊端的针砭，对假丑恶的鞭挞，对人民忧乐的关注，激荡着对时代和人民深深的爱。如《访友人听老妪说家事》：“一畦甜瓜无人摘，满架豆角多老枯。但说后辈离家远，死去凭谁顾果蔬。”这就涉及乡村振兴和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再如《访某名山有感》：“香客随处见，隐士何处藏？叩首寻常事，养心日月长。”人们纷纷到名山朝拜，成为了一种现象，而真正注重修身养性的又有几人？

“和”这一章，大多是作者和文朋诗友们的应和之作，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作者关注现实，砥砺品行，追求高尚人格的气质。

《平易行吟》中的诗句经过了作者精心锤炼又不见斧凿痕迹，可谓浑然天成。有的诗句内敛深邃，有的富有张力，有的趣味盎然，有的意在言外，如，“毕竟青史难神欺，拂尘静读魏武篇”（《碣石观海怀曹公》），“相公莫笑破天荒，王霸求赏事堪悲”（《左宗棠筹边奏请入京会试》），“水激云雾起，波平尘机息”（《茶意》）……由此可见作者古体诗创作的功力。

（《平易行吟》，赵叶惠 著，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他山之石

让历史变得生动有趣

桂范

《给孩子的中国历史启蒙课》，是一部由专业历史工作者撰写、各个断代知名专家审读的专门写给孩子的中国历史启蒙读物。

全书共13册，覆盖神话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和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等13个历史阶段，生动讲述了各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

越是写给儿童的历史，越要严谨专业。为了保证历史的准确性与真实性，所有的编、审老师不吝所学，严谨对待书稿，只为了奉献给孩子一套好读又可贵的历史读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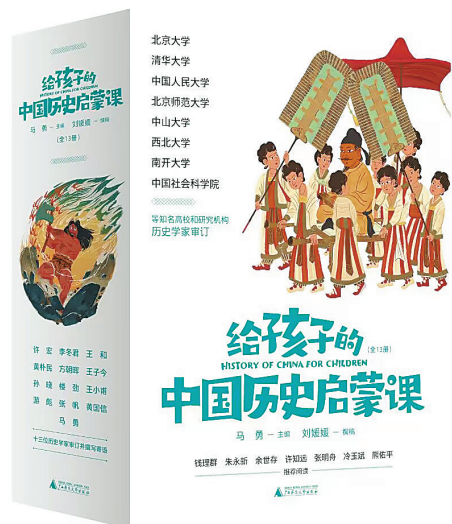
写好历史：寓说理于叙事之中

这套书以故事为主线，每一册都以代表性的历史故事为线索，在故事中呈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让孩子可以轻轻松松读历史，还读得有趣味。经过多次打磨，最终呈现的文本更加丰富和生动了。

以《魏晋南北朝》册为例，每一章都讲述了该册历史时段中的重要事件，章节之间基本以时间为序。每一章内部又由几个小故事组成。第一章“三国群星陨落时”包含“曹魏代汉”“夷陵之战”“完美托孤”和“五次北伐”四个故事，每个故事3页左右，篇幅适中，孩子可以轻松获得“又读到了一个故事”的愉悦感。

在故事的讲述上，不只关注历史本身的是非有无，还要呈现历史的丰富性，历史也是过往人们的人生经历，本就有血有肉。比如《秦·西汉》册讲到项羽英雄末路，是这样写的：“乌江上白茫茫一片，只有一叶小舟荡在渡口。摇船的老翁催他赶快上船过江，劝他回到江东再做筹谋，以求东山再起。项羽却坚决不答应。”寥寥数语，把英雄末路的窘迫与骄傲写得声情并茂。当时的环境“乌江上白茫茫一片”，孤寂、茫然；“只有一叶小舟”，别无他路；“坚决不答应”，宁愿绝地死战，也无法放下骄傲。

注重叙事，用讲故事的方式讲历史，孩子很难不喜欢。



读好历史：引导思考，建立史观

孩子读到了好的故事，获得了美感享受，产生兴趣，这是作者想要通过这套书做到的第一件事。而接下来就是，独立思考，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史观。读史使人明智，会思考的孩子做什么都不会太难。

正如主编马勇所说：“历史是一个消逝的过往，任何重述都是重述者基于当下感受与最新研究。所谓历史是一门常说常新的学问，就是说历史的客观性从其发生就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而不是接近的终结。”历史的“常说常新”可以给孩子提供非常好的思考素材。

以往商纣王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残暴无道、荒淫无度，是中国历史上的暴君典型。在《夏商》册最后一章“商纣王的‘六宗罪’”中写道：“从史书上看，商纣王还是夏桀的升级版，他的残暴与荒淫更胜一筹。尤其是发明了许多骇人听闻的酷刑，对老弱病残也毫不留情，纣王也成了‘昏君’‘暴君’的代名词，所以才会有个成语叫‘助纣为虐’。”

但《论语》中有这样的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纣王的坏，不像传说的那么夸张，所以君子都憎恶失败，失败了所有的坏都会归到他的头上。

张，所以君子都憎恶失败，失败了所有的坏都会归到他的头上。

可见纣王也不是只有一面。在《夏商》册中，作者就用题为“商纣王的另一面”的小节，从保存了上周时期宝贵史料的《尚书》入手，专门为孩子写了与纣王的多面形象。

潜移默化中，这样的讲述向孩子传达的，是一种富有研究精神的、与时俱进的史观。

在这套书中，还穿插了很多小栏目，比如“一起看国宝”“我爱做研究”“想一想”“诗词链接”，等等。这些小栏目专为引导思考、拓宽视野而设，孩子读过故事后，还能通过这些小栏目目前勾后连，举一反三。

学会思考，学会提问，才是我们希望孩子具备的能力。死记硬背，为了记住知识而读历史绝非我们所愿，也不会让孩子喜欢上历史。

画好历史：现代感和想象力并重

给孩子看的历史书，一定要图文并茂。除了书中穿插的文物图片和历史图像，大量的插图都是由插画团队创作完成的。

插画采用了国风的风格，在描绘历史的同时增加时尚感和想象力，绘制孩子真正喜爱的创意插图。

《明》册在讲述明武宗朱厚照的故事时，绘制了“想当将军的皇帝和想当皇帝的太监”插图，用地上的影子反映角色内心。阅读的时候会发现，13册书的前衬页上都有一幅小图，13幅小图放在一起，仿佛图腾集合，给人时尚又古典之感。

为了绘制与文本相辅相成，本身又尽可能具有解读书和信息量的插画，插画团队在创作时查找了大量资料。也是在这样的努力下，最终成书才呈现出翻页有图、图文相辅的形态，读起来更加轻松无压力。

考虑到书中引用的个别历史图像无法突出呈现核心信息，以及如何为历史图像增加现代美感，插画师还将创意插画与历史图像结合起来，巧妙地完成了“古今融合”。

希望孩子通过这套书爱上历史，打开历史阅读的大门。

（《给孩子的中国历史启蒙课》，马勇 主编，刘媛媛 撰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香闲情

此心安处是吾乡

方志远

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经过半年时间的长途跋涉，苏轼终于到了惠州。

一路上，苏轼有过极度的悲伤和失望，但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使他很快从伤感中振作起来。况且，这一次贬谪虽然比二十年前去黄州更加险恶，精神上却觉得更有寄托。弟弟苏辙先知汝州，改调筠州；吕大防、范祖禹、刘安世等三十多位元祐大臣都和苏轼向同一个方向流放。他们所承受的不仅仅是个人和家族的耻辱，还是国家的耻辱。

到吉州了，这是先师欧阳修的故里。过虔州了，先父苏洵曾在这里凭吊白居易。翻过大庾岭，穿过海关，便到广东地界了。

待到惠州地界，苏轼不禁欣喜若狂。有道教“第七洞天”之称的罗浮山竟然就在惠州城北，这是东晋道士葛洪修炼之地。苏轼自黄州开始练气养生，如今到了祖师爷的修炼处，真是上苍的安排：

东坡之师抱朴老，真契早已交前生。玉堂金马久流落，寸田尺宅今谁耕。

世事已不可挽回，仕途如龙潭虎穴，何必再去管那凡世间的底事，这罗浮山不正是修身养性、练气运功的绝好所在吗？苏轼更加明白了，为什么李白才高八斗、白居易文播四海，竟然都皈依佛道。看来，人生诸多烦恼，都是由看破功名而起，一旦将功名名利视为粪土，何处不是世外桃源。

自绍圣元年十月抵惠州，到绍圣四年四月再贬儋州，苏轼在惠州度过了将近三年的时光。

谁说岭南是烟瘴之地，苏轼觉得，惠州的风物之美不让江南：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实，以苏轼的人品，以苏轼的文采，罢不要官又有何要紧，他到哪里，哪里就要卷起一股苏旋风。

南雄、广州、循州、梅州太守听说苏轼到了惠州，都是喜出望外，或派人送酒赠物，或径往惠州看望。至于有地主之贵的惠州太守詹范和博罗知县林抃，更视苏轼为上宾。如昔日苏轼在黄州一样，如果不是连遭贬谪，

苏轼岂能到岭南。广东道士吴复古、苏州僧人卓契顺竟然自告奋勇，当起了信使，替苏轼向弟弟苏辙、儿子苏迈传递信息……历来冷清的惠州城，因为住了个苏轼而变得热闹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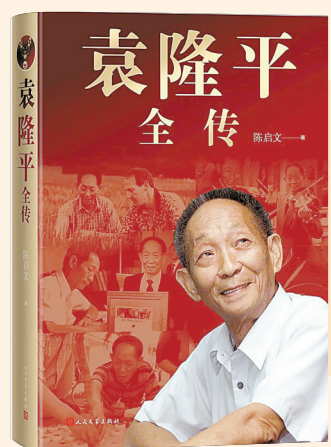
苏轼一性生喜喝酒，仅在惠州，他就至少发现了两种好酒。一种酒是用蜜柑酿成，喝了之后使人飘飘欲仙，有飞天涉水之感，常喝更可强身健体、却病延年；另一种用桂花酿成，酒色盎然，酒香醉人，简直怀疑其非人间之物。

苏轼在惠州，大抵是做三件事：喝酒、悟道、爬山。这是他在黄州时开始养成的习惯，一日不饮酒则病，一日不悟道则病，一日不爬山则病。但是，一旦能为百姓办事，三者皆置于脑后，百病不入。

有人对苏轼在惠州时策划的公益事业做了统计，大者不下十次。博罗县大火，苏轼一面积极组织救灾，一面说服广东提点刑狱程正辅上书朝廷，为正在休假的县令林朴解职干系。惠州驻军缺乏营房，散居市井，骚扰百姓，苏轼帮助知州詹范筹措资金，盖起营房三百间，使军民相安。广州居民饮水困难，苏轼致书广州太守王古，建议以竹竿引蒲涧水入城，解决了广州饮水的问题……

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人，不管处于何种地位，总是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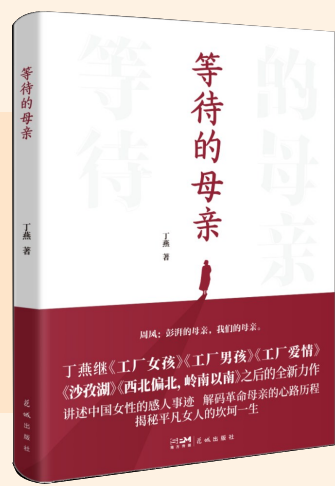
走马观书



《袁隆平全传》

陈启文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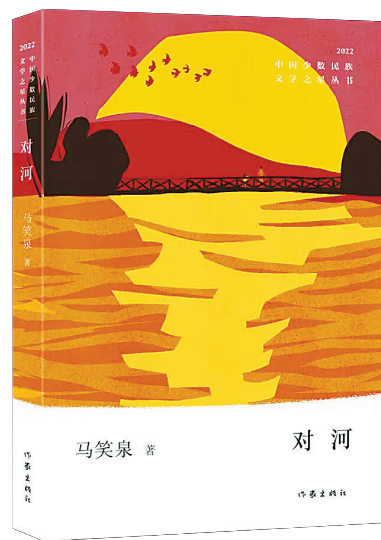
本书全面深度追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近百年的浩荡人生。一面叙写袁隆平的家庭生活、求学过程、专业选择等，一面则以袁隆平取得的研究成果为节点，步步推进，详细介绍袁隆平如何攻克一道道世界级难题、成长为世界顶级科学家的艰辛经历，还原出一个率性、淳朴、锲而不舍、一生追求创新与超越的袁隆平。



《等待的母亲》

丁燕 著，花城出版社

纪实文学《等待的母亲》讲述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的母亲周凤的一生。本书以周凤的百年人生经历为主线，以别样角度勾连起百年党史，为红色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风格。作为“革命母亲”的周凤，在彭湃牺牲后，承担起抚养孙于彭士禄的责任，不仅塑造了母亲勇于向前、不畏牺牲的女性形象，还传递出中国革命者的伟岸精神。



贺秋菊

从文学寻根到地方性写作，我认为必然是为找到一个承载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属于作家个人的“地方”。在我看来，马笑泉小说集《对河》建构的“对河”，正在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地方”。

作家因故乡丰沛的生活而拥有丰富的人生。重返故乡，建构自己的文学“地方”成为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动。马笑泉也不例外。

他研究梅山文化，追寻家乡那些亦真亦幻的异人轶事和民间习俗，持续书写一个叫飞龙县的地方，熟悉的山川、气候、物产、熟悉的人物、语言、生活场景，熟知的历史、文化、风俗，落笔为故事的血肉。在《愤怒青年》中，他通过对小镇青年的观察与书写，以冷峻之笔审视时代，捕捉到了转型时期的特定征象。在《银行档案》中，他尝试进行文体的开拓，如档案一般的客观记录与写实，在客观真实可信中展开一个时代一代人的褶皱。《迷城》《日日新》可以看作是作家对现实的近距离审视，而从小县城到省城，既是地理空间的挪移，也是文化空间、精神空间的开拓。

这种拓展让他找到了“对河”。《对河》《离乡》《诗兄弟》《笼中人》等四个中篇小说，体现了作家对故乡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的追寻、想象和叙述，重新发现并建构了“对河”这个地方。一个“既不是街上，也不是乡里，那就只能是对河”的地方。《对河》开篇写道，“长期以来，我都把对河看成另一个地方”。“对河”在马笑泉的小说中时隐时现，它不像“飞龙县”那么引人注目，却始终令人牵挂，仿佛那些美好、神秘的事物，都要跨过那座仿佛看不到尽头的大桥，去到“对河”才能找到。“对河”是作家心中那个地方“唯一贴切的名字”。

“诗人完全符合我对那个地方的想象”。《对河》《诗兄弟》《离乡》直接将诗人作为主人公，《离乡》的主人公雷安野同样拥有诗人气质，廖独行在城市折腾一番回到乡村。雷安野走出乡村的“荒屋”进城发展，经过那条“著名的大桥”去河对面，他还只能注意到河对岸“是和县城隔岸相望的一个小镇，后来才晓得它是县城的‘迷城’。”“我”不仅认识了一位来自对河的诗人，去省城读书时还喜欢上了“对河”的姑娘。

作者通过人物之口探讨了“对河”的地方性承载。比如，“跟河这边同属于一个镇”，“它是介于县城和乡村之间的一块地方，一个边界和归属都难以确定的过渡地带”，是一个“我丝毫没有把握的地方”。“我”乐意听大人们讲他们与对河的往事，大人们却不怎么在意这些。“我”不断地观察对河来的人的穿着打扮、走路的姿势、说笑的口音，发现“对河的男人比我们稍显土气”，而这种土气并不是穿着打扮不时髦，相反是太过时髦。“对河的女人更好看”，是因为她们身上散发着自然的芬芳。

大桥是通往“对河”的地方，“我”记忆中的“大桥仿佛长的没有尽头”。无论是从“对河”进城，还是从街上去“对河”，走过大桥的他们最终不约而同地毅然告别。比如，在女孩家看到她躲在门后惊慌失措的样子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喜欢的并不是这个小女孩，而是另一个她”，于是，“我”怀着越来越深的后悔与悲凉，离那个对河越来越远”。雷安野进城也决定“离开这里”。诗兄弟廖独行更是以一种极为悲壮的方式告别，诗人王文真在走过廖独行这座大桥以后，就此“中断了持续多年的诗歌写作”。笼中人“我”更是“把办公室的门重重一甩，大步走了出去”。

在“对河”中，我们读到了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代青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与焦虑。这些矛盾与焦虑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共同的矛盾与焦虑。从飞龙县到“对河”，马笑泉已然跳出了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书写，通过重新挖掘、重新审视和重新出发，展开和生成新的“地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对河”。

（《对河》，马笑泉 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悦读

